

拂去历史的尘埃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

作者 双石*

双石，本名周军，成都电视台记者、编辑、计算机高级工程师，业余军/战史研究学者。曾著有《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全景纪实》、《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记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枪渡金沙江之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近8年来组织考察队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完成《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的复原》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及战斗考证》主题考察报告，填补了红军长征研究史中的空白。

目录

前面的话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1
第一章 “西进”问题的缘起	3
一、从“打通国际”说起	3
二、张国焘忽“左”忽右，北辙而南辕	5
三、再次北上，有着复杂心结的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8
四、张国焘不来会合，毛泽东也准备单独“打通国际”	9
五、“分攻宁、青”——“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	12
六、凑足了本钱再说话——张国焘响应毛泽东的缘由	13
七、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分攻宁、青”的方案	15
本章要点	17
第二章 “甘南风波”——张国焘力主西进不果	21
一、共产国际“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	21
二、西北局朱张陈提出“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	22
三、徐向前有意见！对什么有意见？	23
四、张国焘为何变脸？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25
五、空前复苏的党性——岷州会议否决张国焘意见	26
六、枪杆子指挥了党？——漳县会议推翻西北局决定	27
七、天不作美？“西进”的心芽还要复萌！	30
本章要点	31
第三章 “提前攻宁”——张国焘要“借船出海”	35
一、提前攻宁——“甘南风波”造成的后果	35
二、毛泽东“依造船情况为断”有“败笔”之嫌	36
三、西渡重于一切——张国焘得了寸，就要进尺	38
四、所托非人也得托——中共中央一个不得不犯的错误	40
五、张国焘率先挑战《十月份作战纲领》	42
六、彭德怀等不来也找不着徐向前、陈昌浩	45
七、陈昌浩关于渡河前夕的回忆文字评析	47
本章要点	50
第四章 三军竞渡为哪般？	55
一、只有李先念有理由有资格这样发问！	55
二、“先斩后奏”之后的“斩而不奏”	57
三、翻云覆雨——红军总部上演的变脸戏(一)	59
四、釜底抽薪——红军总部上演的变脸戏(二)	62
五、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张国焘惹翻的可不是一两个人！	65
六、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一道“多项选择题”	66
七、对陈昌浩关于西渡行动回忆文字的评析	68
本章要点	69
第五章 问君西去何时还？	74
一、“不受一切牵制”——“徐陈”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	74
二、彭德怀河东决战不果，河西部队西进之势呼之即出	77

三、“作战新计划”的纠结——原西路军领导人误会之言被讹用	78
四、“取得外援回师横扫而东指”？	81
五、不能互洽的记忆——回忆文字 PK 历史档案	84
六、放心不下的毛泽东没有理由不相信“徐陈”的满满信心	86
本章要点	88
第六章 河东河西，谁主沉浮？	93
一、众人都说南下必行，远在保安的毛泽东却看到了战机	93
二、“只有战胜胡军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95
三、一派乐观之下的游疑——“任务次序”之询缘自敌军追尾	98
四、河东一战而改变战局，河西部队却困境初现	100
五、小瞧了“马家军”——“徐陈”、“朱张”和毛泽东都有误判	103
本章要点	106
第七章 “自主”与“外援”的纠结	111
一、“就地坚持”，凭什么靠什么？	111
二、“我们主张主力速来”	114
三、西进无问题，东进有条件——西路军失去东返良机	117
四、乐观与悲观，三天一个大翻转	120
五、牢骚满腹，纠结的不是“西进”是“外援”	124
本章要点	126
第八章 东返？西出？西路军进退失据	131
一、一字长蛇首尾难顾，西路军陷入困境	131
二、“东进”之议再度提起	133
三、“英雄战死错路上”	134
四、“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的确缺乏……”	137
五、游疑难断，西路军首长方寸已乱！	139
本章要点	141
第九章 回天乏术，西路军走向覆灭	143
一、力排众议，毛泽东要派兵增援“徐陈”	143
二、“银弹攻势”，穷得叮当响的共产党真是急得没招了	146
三、大势已去，无力回天——西路军基本解体	149
四、百战蹉跎归去来——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	153
五、4000 多名西路军将士陆续回到党的怀抱	156
本章要点	159
第十章 余波回荡七十年	164
一、中共中央就西路军失败原因作出结论	164
二、难能可贵的报告——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的反思与总结	167
三、数十年后，《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的反思与总结	170
四、改革开放后对西路军问题的一些新意见及其影响	175
五、“西路军蒙冤”？——陈云、邓小平的批示被无度引伸	179
六、红西路军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	180
附一：关于李先念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 52 份电报目录的有关说明	183
附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关于西路军部分的阐述	193
本章要点	194

结语 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	197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	200
1935年.....	200
6月.....	200
7~8月.....	200
9月.....	201
10月.....	201
11月.....	201
12月.....	201
1936年.....	202
4月.....	202
5月.....	202
6月.....	202
7月.....	202
8月.....	203
9月.....	203
10月.....	206
11月.....	213
12月.....	220
1937年.....	223
1月.....	223
2月.....	226
3月.....	229
4月.....	232
5月.....	233
6月.....	233
7月.....	234
8月.....	234
9月.....	234
11月.....	234
12月.....	235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附图集.....	236

前面的话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西路军史学研究进入误区的要害及关键

酝酿了好几年，也犹豫了好几年，还是决心壮着胆子来写写西路军问题的考辩。

笔者之所以犹豫难决，是因为考辩西路军的历史，无法回避一些曾任西路军领导人的革命前辈于改革开放后，在急于解决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特定环境和急迫心境之下，对西路军问题所作出的重新评价。若坦然相对，别说成书出版，就是公开发表相关文章也难；但若回避，许多历史纠结则成了解不开的疙瘩。而这一历史疙瘩若不开，不仅在西路军问题上妖魔化毛泽东的种种谬论不能批驳，以徐向前、李先念为代表的广大西路军指战员的人格境界，也将受到严重贬损。因为从一般逻辑上看，倘若毛泽东真是某些史学家指责的那种“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的“阴谋家”，那么，在此之后依然矢志不渝追随毛泽东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不就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或者“没有政治头脑的庸人”，再不就是“缺失爱憎情感的打手”？这与当年的国民党反动将领，还有什么本质区别？

更为严重的是，如今，一些曾在西路军担任重要职务的革命前辈，依据被选择性提供的历史电文所做的结论，不仅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一步无度引伸与曲解，更被利用成为妖魔化毛泽东的史学依据，进而成为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仙逝若干年后才逐渐显现的这一严重政治后果，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之灵有知，都是不会答应的。这不仅是西路军史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也是研究著述中国革命史必须收复的一个史学阵地，更是维护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格形象不可缺失的史学工作，因为，只有正确解释了西路军的历史曲折，才能正确解读包括西路军将士在内的人们“万众欢呼毛主席”的人格境界，乃至他们当年人生选择的逻辑必然。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一次重要挫折。关于酿成这次挫折的成因，先后进行过两次剖析和探讨，其间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两次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第一次结论产生于西路军刚刚失败的1937年3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因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结论”则缘于半个多世纪后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重新审视与探讨，一些历史当事人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先后参与其中，虽未在党内形成正式决议却也亮出了后来被学界主流广泛认同的看法：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这些看法推翻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结论，如今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权威党史军史典籍和各种传媒，甚至还引伸出了诸如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毛泽东“为了争取党内斗争的强势地位，不惜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局上出险着下险棋”、等等“阴谋论”，毛泽东也成了以权术排除异己、“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的“黑老大”！这些不属“正式结论”却胜过“正式结论”的耸人听闻之说迳而走，还广为流传了三十年，迄今仍然拥有不小市场……

比如，2011年3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登《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以“话题缘起”提问：“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再由编辑部所拟的段落标题给出了答案——“战略指挥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正文中，还有一句“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该文被广为转载、转贴后，跟帖也以指责毛泽东是“阴谋家”的留言居多。

这大概也是所有经历过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中共领袖及红军将领所始料不及的。

后来直到今天的学界、媒体和出版界甚至呈现出这样的反常状况：对毛泽东的批评、批判乃至诋毁，怎么着说道都行；典籍中的开国领袖群体中的人物词条，只有毛泽东享受着“说了功绩必言错误”的“特殊待遇”，而其他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后一直身处高位的历史人物，则只有功绩没有“错误”，有批评意见批评文章也很难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要想成书也很难通过审书这一关；党办刊物或党校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责难到达了苛责的程度，却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百般宽宥和辩解……

然而，在以“颠覆历史”为时髦为潮流的当今，这还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

君不见，这种“颠覆”，已经追剿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

看来，正被或将被逼迫得退无可退的，已经不光是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

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降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抗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统统都在被颠覆被清算之列……

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这样的“颠覆”竟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党内，到党外！

还能再退么？还有路可退么？还能退到哪里？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国号换国旗？退到“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替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退到中国共产党也改名易帜换主义？或者干脆用孔夫子来取代马克思，共产党员全都进孔子学院重新洗脑？要不就全体解散，然后分头去补“三百年殖民地”的课？……

“西路军问题”，现在已不光是“党内问题”，而成了“颠覆历史”者的一个大杀器。

这般“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年要全盘改写西路军历史的当事人们，愿意看到么？

我想他们不会愿意：真要退到这步田地，他们毕生的革命历史，全都变成了罪恶！

既然西路军史学界颠覆历史妖魔化毛泽东的喧嚣早已甚嚣尘上，并且已经影响到了为数不少一批人，那么，我们即使仅仅从维护父辈义无反顾追随人民领袖毛泽东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格境界出发，也有理由、有责任、有义务为历史正名，为毛泽东正名！

既然退无可退，好！那就站稳脚跟，操家伙上场，跟人比划比划，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

这要操的“家伙”哩，大都是颠覆学问者们也认同也使用的一大堆原始文献，特别是他们有意无意遗漏或有意无意疏忽分析的重要原始文献。

而笔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一笔一笔，来算个底掉儿！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注释

¹夏宇立《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原因探究》，《香港传真》2009年30期第32页。

第一章 “西进”问题的缘起

一、从“打通国际”说起

要讨论西路军问题，就得从“打通国际”说起——这是“风波乍起”的由头之一。

“打通国际”，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

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他们自身的力量太薄弱了，他们面临的对手太强大了，他们经历的失败太频繁了，他们付出的牺牲太惨重了！一句话，他们太困难了，他们太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祖国”实际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帮助了！

实际上，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尝试在沿海地区策划武装起义，寻求建立“打通国际”的红色港湾，盼望着那些悬挂着镰刀铁锤国旗的航船鸣笛靠岸，在送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谊”的同时，也把满载来的武器分发给急待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群众……

在力量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这些尝试的结果可想而知。

海路不成，就寻找陆路——与苏联、蒙古接壤的陆路通道。

早在大革命后期，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就曾提出过推动中国革命向西北方向发展，以接取苏联援助的“西北计划”，中共中央也曾于1928年2月向国际代表提出了在陕西建立根据地与苏联接通的设想，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¹。这当然也是有其缘由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还是革命的主流力量而共产党人的力量又过于弱小，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纷纷把山沟沟当作“革命摇篮”的趋势，又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人着实怀疑：这样的革命，难道还能有成功的希望？……

不但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也缺乏深入的了解。

共产国际领袖布哈林就曾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新生的中国红军只能在分散和游击中生存，今天在这里吃鸡，明天到那里吃鸡，以免把一个地方的母鸡都吃光了²。

银行家肯定是不给贷款给看不出有发财希望的穷光蛋的，这基本上是一个铁律。

然而几年过去了，这山沟沟里的“革命摇篮”摇来摇去，竟然摇出了一个个生气勃勃活蹦乱跳的半桩娃娃，这就让共产国际的革命大佬们有点刮目相看了：在大城市里呆不下去了的中国无产者们，没有如同“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那些大炮来轰鸣号令，也还是可以在交通困难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里，抱出一个又一个“苏维埃”孩子来哈？！

于是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通国际获取国际援助”也就真正开始进入了计划日程——

1933年3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获悉了撤离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就给予了肯定：“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³；次年9月16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也开始设想：“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并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⁴……

到了1935年4月，已经很长时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共产国际认为：“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为此，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明确肯定了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⁵……

两个月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会师，会师第4天的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也第一次将“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列入了党内正式文献——那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⁶

由此可见，西路军失败后清算“国焘路线”时，笼统地将“西进”说成是“逃跑主义路线”，的确是失之简单也极易引起误读和曲解！“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的设想，是党中央首先提出来的，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抽象而言，概括而言，不放在相应环境和特定条件下来衡量来比照，是不存在“错误”或“正确”之分的！——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军不也一样浩浩荡荡地“西进”了么？你说这是正确还是错误？

然而从来就没有在“真空”中发生的战争！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党中央虽然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实际上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是有兵力部署重点的——是“一部”，而不是主力，更不是全部；也是有时间设想的——以“适当时期”，作为一种“战略远景”来设想的！而且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党中央在这里提出这种战略设想，更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刚经过大失败大逃亡的党内军内“打通国际”的普遍呼声与急迫心情的一种安抚性回应！因为几个月后的12月1日，在中央红军主力与陕甘红军在陕北实现会师，真正开始接近“打通国际”目标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了对“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真正态度：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⁷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己！既或是要求人，也得先求己！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贷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从“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到“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打通国际”之“根本方针”在认识上的更新和升级——这句话的广义延伸，就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而这一关键性信息的深刻内涵，应该是非常值得党史和军战史研究者们留意和关注的——至少是不应该忽视、漠视甚至直接无视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关键性信息，的确是被不少学界中人“忽视、漠视甚至直接无视”了！

当然这也难怪，就是在当年，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普遍共识”。那年那月，在大失败大挫折后迭遭身心重创的他们，心目中或许还存有这样的“当然之念”：一头钻进“无产阶级祖国”的怀抱，拼命吸吮“共产国际母亲”的乳汁，裹好创，养好伤，获得抚慰，补足精神，再回过来头来跟“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拼命……

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思所想显然要高于和超出这个认识层面：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要站在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参与并领导群众斗争！只有站在民族革命斗争历史大潮的潮头，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共产党人才能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与全力支持，才能为民族也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更多更好的机会。任何远离民族革命斗争大潮中心去寻求偏安之隅的念头，都在理当受到批判与唾弃的“逃跑主义”之列！而极其靠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投入民族革命斗争的立足点，也是出发点，只能力求发展——向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发展，而不能轻言“脱离”。

一个正确的认识，要被更多的人乃至大多数人接受，需要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

而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大对决中，这种检验，往往需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完成。

比如，这段日子跟毛泽东信来信往磋商探讨的张闻天，就与毛泽东的观点存在着微妙不同。

1935年12月23日，他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是这样说的：

总的目标是：消灭卖国贼，准备与日作战，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巩固扩大苏区，打通国际路线。打通苏联与巩固苏区。现在要争取同时实现，使其不冲突而发生联系，但

有可能打通国际而暂时离开苏区。我是反对长久停留一地的。五次反“围剿”战争经验证明，这样做反而伤元气遭受损失。为了长期与敌人作战，红军行动要更广泛、更活一些。红军走了，敌人注意红军，苏区才能巩固。⁸

这显然与共产国际领袖布哈林的“吃鸡”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与“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也有所不同——此前，张闻天在与毛泽东通信中所谈及的“打通国际”方案是：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向北前进，立即夺取宁夏或五（原）、包（头）地区，“与日帝争先机”⁹。

对此，彭德怀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有极大危险性，没有估计到下列的严重问题：（甲）严冬行军消耗大。（乙）由榆林、宁保〔条〕梁起北进，沿途系蒙族，宁夏多回族。（丙）宁夏地形险，南凭黄河，北依沙漠，在战役、战略回旋地小。城极坚固，且多土寨，如遇少数民族坚壁清野，取粮不易，扩红困难。（丁）敌固守城寨待援，陷我军于进退维谷。（戊）张学良、井、高等，有进至榆林、三边构筑封锁线，以至迫进黄河间，同以重兵坚守包、绥、五原线，以日帝为后援，摧残陕、甘苏区。（己）有将红军进入宁、五线以北之沙漠中的可能，这种取径出宁夏企图，以现在自己力量不可能的”，而且提出了与毛泽东相似的意见：“为完成上述任务，须在陕、晋最少扩大到一万五千新红军，并现有全部二万五千红军。似此，以主力夺取绥远、五、包三个城市，以适当力量留陕、甘、晋苏区，配合地方武装行动，巩固和发展现有之苏区，求得短期内与进占绥远主力联成一片。”¹⁰

而在半年前的6月间，对中央提出的“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有人马上就作出积极响应。当时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就是这个提议的第一个响应者。

二、张国焘忽“左”忽右，北辙而南辕

对于朱毛周张在1935年6月16日的这个电报，张国焘是这样回复的：

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¹¹

这就不是战略远景，而是马上就要付诸实施的近期目标了？

然而，此间的张国焘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其实并无定见，这句话也只是他犹疑不定头绪纷繁的复杂思维之一缕。因为9天后的6月26日的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关于战略方向的意见，就已经与这句话“北辙而南辕”了——史载，在那天的会上，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¹²

张国焘在会上是这样说的：

……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¹³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的陈述也可资佐证：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¹⁴……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国焘此前的“远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不仅谈不上“成熟的方案”，而且是非常机会主义的，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个人私欲未得满足后的一种“意气用事”！——如果还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心态就是：寻求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而这种心态与志在“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要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风口浪尖上去为团队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寻找机会的毛泽东等人的思维层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数十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相当精辟地道出了这种“不可同日而语”：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15
... ..

这种思维层次的差异后来演变而成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激化到了有可能在红军内部诱发冲突的可能，从而直接导致了党中央被迫率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也直接导致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大举南下。再到后来，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迭撞南墙之后又不得不西进康北舔伤裹创，张国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曾被斥之为“右倾逃跑”的“北上”路线……

而实际上，即或是在这个关于“南下”还是“北上”的“激烈的争论”时期，就已经孕育着北上乃至北上之后是向西还是向东发展的分歧。其间，张国焘“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一定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时有发作。比如，1935年8月4日~6日在沙窝（今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黑水县血洛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就对两河口会议已经决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方针表示了怀疑¹⁶；而沙窝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台组，分为左、右路军分途北上，执行旨在“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¹⁷”的《夏洮战役计划》且左路军也根据这个计划进至了阿坝后，张国焘却又在那里再度萌发了“西进青、新”之念……

然而客观而言，张国焘的这些念头，也并非无源无本。而其源头之一，就是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的来电，这个电报在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提出：“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¹⁸。

这后一句话的确很成问题。在没有外部援助情况下，是否能“在人烟稀少之地”为主力红军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姑且不论，就说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民族矛盾空前加剧的历史时期，这个两年前的指示也显然失去了时效：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样的当口，正是共产党人勇敢地站在“抗日救国”历史大潮的潮头去挽救民族危亡，也摆脱自身危机，从而赢得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机遇啊！这个时候要找个远离风口浪尖的偏僻之地躲起来，那最多就是一个地方土军阀的格局，还能有什么大出息，还能成什么大气候？

那年那月，在群雄会萃的红军领袖群中，毛泽东把这一点看得比谁都清楚明白！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毛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徐向前、陈昌浩等参加了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方向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¹⁵”。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路，意义非凡。
在为会议作总结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

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²⁰

毛泽东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们的一致赞同，并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对《夏洮战役计划》之宗旨作出了修订和补充：“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²¹”，并且明确表示反对“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²²”。

为此，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与也曾多次致电张国焘，解释中央北上方针，对张国焘进行规劝：“以主力向黄[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²³”，“……不宜分兵出西宁²⁴”，“……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²⁵”，“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²⁶”。

连徐向前、陈昌浩都反对，张国焘只好给“西进之念”暂时上了一把锁。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多年后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后修改政治局会议决议草案时曾对他说过：“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对此，刘伯承十分感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²⁷。

这场“东西之争”暂告一段落后，张国焘又经过了一番左扭又捏，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下”。

“南下”是个什么结果，应该没有什么可置疑和争论的吧？

其实当事人之一的徐向前的亲历感言就力透纸背，足以一锤定音：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²⁸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道出的。

然而，在“北上”与“南下”的分歧中孕育的这个“东西之争”，在“南下”与“北上”的分歧被历史事实予以终结之后，却又迅速膨胀成为了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新的重大分歧，而且还导致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一系列严重后果！究其根源，其实就在于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的基础并未得以消除：张国焘此间乃至此后的一切“路线”，都是以“寻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为出发点的，而且还对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此间乃

至此后的思想和行动，产生相当一段时期的严重影响。

这也是作为后人的笔者不忍道出，却又不得不道出的一个冷峻无情的客观事实！

三、再次北上，有着复杂心结的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南下”失败之后，大伤元气的红四方面军被迫西进康北舔伤裹创。此间，张国焘在不得不考虑“北上”的同时，又再次打起了“西进青、新”的主意，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在这个时期，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北上”的议论和呼声，也越来越大。张国焘的个人权威，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潜在或非潜在的挑战。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康北前拟定的《康道泸战役计划》，原本是旨在“继续扩大南下胜利”且“向康定进击，以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²⁹，但徐向前、陈昌浩等在执行过程中强调的却是“应先取道孚……开展新方向的发展”³⁰。而据刘伯承回忆，当他率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作为先遣队从丹巴出发前将“南取康定”为主的原计划改作“北进道孚”时，就连张国焘的亲信、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都未予阻挠³¹。虽然此后张国焘仍然坚持“决以主力首先灭李抱冰取康定，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准备”，甚至还以严厉口吻声称“反对可能因此次行动所引起的失望消极的情绪”³²，然而在3月间红军总部拟定下达的《康道泸战役补充计划》中，他的那个“决取康定”的企图，还是变成了“相机取康定”，而且还被追加上了“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道路”³³……

1936年4月中下旬红二、六军团抵进金沙边畔，张国焘在派出罗炳辉等率红三十二军前去接应后，又拟增派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主力南下雅江地区，以“相机消灭雅江李[抱冰]敌”，并要徐向前前去统一指挥³⁴，而徐向前回电的口气却是相当客气：“我军是否想在雅江附近与敌决胜负？”甚至还明白无误地表示：“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³⁵。

——那个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似乎是再也听不得见不得有人再提“南下”了。

年前草地分裂后，张国焘曾经另立了自任“主席”的“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主席原为朱德）。而在红二、六军团进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6月初，在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压力之下，张国焘也不得不宣布“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³⁶，几天后又宣布取消了自己另立的那个“临时中央”³⁷。

到了6月中旬，徐向前干脆就带着红四方面军直属队和部分部队率先启动了北上的行程。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会师时，他已率部进至了杜柯河畔的“下倮科”（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曾克寺一带）³⁸……

张国焘的个人威望，的确已经降低到了自他执掌这支红军主力以来的最低点。

而前来会合后的红二、六军团首长“谋求党内团结”的表态，也使张国焘很难再作他想。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前后，张国焘还希望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站在自己一边，对由此增加与党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也曾派人往红二、六军团送《干部必读》，乃至个别约见红二、六军团干部，不料碰到的却基本上都是钉子——个别人虽然一时被忽悠，经朱德总司令谈话后也立即转变了态度。

张国焘还不死心，在与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同为党内元老的任弼时单独谈话时，又提出“六军归我指挥”、“二、六军换首长”、“另派政委”等等要求，却均为任弼时所拒绝。张国焘又派周纯全向任弼时传话：拟召开两军干部会议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在中央苏区积极批判过毛泽东却有着很强党性的任弼时当即对周纯全坦言相告：惟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基础上才能一致，明确表示反对召开两军干部会议，理由是“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而当张国焘继续要求召开两军联席会议时，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则一起向张国焘设问：开会谁作报告？发生争论由谁作结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甚至直接了当很有底气地对张国焘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会上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的态度尖锐起来，我不负责任。”³⁹……

张国焘是不得不怀揣着别别扭扭的复杂心结，踏上了北上行程的。

说张国焘是“别别扭扭”地踏上北上行程，那还真是没有冤枉他——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求吉寺时，这位“张主席”又故伎重施，想如同年前一样掉头西返，在西北局求吉寺

会议上提议从齐哈玛渡过黄河（这意味着又要从求吉寺向西返回草地），西进青海、新疆。其“复杂心结”，当然还是不愿与中央会合，继续寻求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

时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傅钟回忆道：

在救济寺[引者注：即求吉寺]会上讨论北进计划时，张国焘却对原拟的北进岷、洮、西的计划，只是在口头上说一说，而不做实际部署。相反，却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这遭到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原来，二方面军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过去青海的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没有再声张。现在看到部队已和党中央愈来愈近，就又提出这种计划来。朱总司令细心分析，判定事关全军的战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时同志也说，有三条理由不能西去。一是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别的矛盾尖锐了，对蒋介石的现行政策是个摇动；第二，我们和一方面军会合，突破张学良的“围剿”，陕甘宁三省会成为我们抗日前进的根据地，结束我们的流动；第三，红军主力配合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黄河以西处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会上，同志们对任弼时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张国焘看势头不对就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企图。⁴⁰

而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怀揣如此复杂心结的应该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复杂心结”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闹僵了，分手了，分手后还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狗屁不是，这边还另立了一个中央！现在哩，还真让人家说着了：“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这回要是两边儿一照面儿，咱是羞也不羞恼也不恼？都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血性汉子，都是尸山血海拼出来勇冠三军的沙场战将，就那么轻易认输？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谁不想是骡子是马咱走着瞧遛着看？！如此等等情绪搅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适的能够重新证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机会，其进发的动力也是很强劲的……

不愿意南下愿意重新北上是一回事儿，愿不愿意与党中央重新会合又是一回事儿。

而且，这种心结一旦与山头宗派情绪掺和起来，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负面效用之虞……

作为后人，我们在进行相关历史研究时，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这些就连张国焘在内的诸多当事人也并不讳言的情结。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种惯性，“告别昨天”和“拥抱明天”之间，还横亘着一个“承前启后”的“今天”！消除“昨天”的惯性，是一个渐进磨合而不是截然分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一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这也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怕”的心态也无需讳言和回避：怕被上“路线纲”，怕被党内斗争“清算”！想当初，我们从通南巴千里转战欢天喜地来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来的好些中央大员却一拉下脸子就指责我们“军阀”、“土匪”、“逃跑主义”。现在哩？我们落了难，走了背字儿，要再遇上他们，被损了骂了可能还算是轻的，要是再“开展党内斗争”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自保，恐怕是当时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都在掂量的事情。

正是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为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乃至会师之后的“故态复萌”，为后来西路军“未能克服张国焘路线”，提供了得以生长的情绪环境和思想基础。

四、张国焘不来会合，毛泽东也准备单独“打通国际”

几乎就在红二、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的同时，党中央也在作“打通国际”的谋划。

其实这种考虑和探讨早在年前他们到达陕北后就开始了，但正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基本战略设想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接通国际”，而相关的预案也一直在酝酿探讨之中。1936年春红军东征后，毛泽东等就曾提出过红军行动的方针：“在华北首先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较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目前阶段战略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陕北联系起来”。而在采取此一行动前，还必须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苏联军委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通讯联络，以便弄清楚苏联“能否接济步枪、步枪弹、轻重机关枪、高射机

关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等。如能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两次。”⁴¹。

虽然因红军东征受阻，这个设想没能实现，但中共中央仍然没有放弃“打通国际”的方针。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之时，毛泽东与彭德怀也在讨论“打通国际”的路线——

德怀同志：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本书作者注：甘州，今张掖市；凉州，今武威市；肃州，今酒泉市]，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丁、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戊、如能在东岸解决马鸿逵一部又能抢到船只时，或东岸虽不能而依据已得材料我军有在西岸战胜马部之把握时，则均应准备西渡。

己、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同时告诉左聂徐程四同志，亦望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毛泽东

二十九日⁴²

从该电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红二、红四方面军是否能够北上尚无把握的时候，就准备以红一方面军的力量，独立承担“接通苏联”的任务。而在“接通苏联”的路线选择上，毛泽东比较倾向于“宁夏路线”，而对“西进甘凉肃”这片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估计，也比较乐观——“……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

这个估计与后来西路军的转战历程相映照，不能不说有“过于乐观”之嫌。

一个多月后的1936年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至甘南地区，三军大会师之前景在望，中央红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中共中央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间的秘密谈判亦在进行之中。于是，中共中央“接通苏联”设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选的路线，就是宁夏——据说“夺取宁夏”最早是出自于张学良的建议。这个建议除“打通国际”内容外，应该还包含有为红军改变生存状况赢得生存空间的考虑——甚至还有可能是更重要的考虑。

张学良是怎么提出来的，具体是在哪一个时间提出来的，笔者目前尚未查阅到相应的史料。但中共中央领导人1936年8月9日曾致信张学良，信中称，中共中央对张“所提出的问题及意见，经过慎重讨论”后，将相应建议写在了这封信中，并委托潘汉年带到西安与张学良商洽。

信中有关“打通国际”和“夺取宁夏、甘西”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二)乘蒋注意西南、无力此顾之际，我们的整个计划须于八、九、十三个月完成其基本部分。

(三)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军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部)，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三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四)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苏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从战略上巩固内部来说，好好的完全的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准备必要时，以兰州为中心。

(五)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的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得有困难，便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新疆的协助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其详情请问赵年同志。

(六)……因此我们在第一阶段上，应该采取保持甘青宁三省的原则，完成打通苏联、巩固内部的基本方针。在对时局的策略上，表示了我们确实不是内战，面是对外。在对内部的号召上，我们不是退却，而是北上抗日。在部队的巩固上，必须集结，才便于改造。在对蒋介石向我进攻上，必须先退一步，然后有利于打他。在打通苏联的问题上，向西才能执行。在肃清王均、毛炳文、马步芳、马鸿逵等等反动分子上，也要向西集中。在对日作战问题上，必须以攻击的方向指向绥远，才能有力的号召时局，不使人家说我们是假抗日，才能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必须在一个确定的地区内，实行我们真正为全国模范的民主政治。……

(八)有一种可能是应该想到的，就是当我们顺利的占领了兰州，又占领了甘凉肃及宁夏，实际上打通了苏联，并且出兵绥远。不但战略上取得了稳固的形势，而且政治上（抗日）蒋介石也无法反对我们时，他会转而将错就错，只求我们不打他，他也不来打我们（在他无法战胜我们的情况之下），这种可能也许是会有的，但关键全在乘蒋注意西南时，我们以突然的姿势占领兰州，打通苏联，那时不管他来打也好，不来打也好，我们都有胜利的把握。⁴³

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甘西”以“打通国际”战略方针的最初版本，就是在“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的一部”的前提下作出的设计，而当时他们在对“宁夏”与“甘西”各自重要性的认识上，还是“甘西”重于“宁夏”，这是“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而且，新疆的盛世才在几个月前的3月15日，就曾经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写过一封堪称“肉麻”的信，信中极为谦恭地将王明称作“革命导师”，甚至还作出了极为动人的表示：

(1)必须使红军能够充实自己的装备（主要是武器和弹药）。

有消息说，现在中国红军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武器和弹药非常缺乏，我极为关心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红军的最终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为了尽快地完成中国革命，必须使红军能够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我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当然愿意援助红军武器和弹药，问题只是他们担心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知道这件事。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三位革命导师同意给红军以武器和弹药援助，那么我就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使这件事绝对不让新疆居民、南京政府或帝国主义知道，以便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使苏维埃地区能够迅速得到发展和扩大，因为中国红军的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前景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前景的胜利。⁴⁴

如此恳切的主动承诺，简直就是“不由你不信”。

于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12日，拿出了“夺取宁夏、甘西”计划的最初版本。

五、“分攻宁、青”——“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

这个“夺取宁夏、甘西”的最初版本，首见于中共中央致中共西北局的这份电报：

朱张任同志：

(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击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2.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3.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

洛、育、恩、博、稼、怀、凯、泽⁴⁵

这是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的内容，其中“打通苏联”行动是拟与东北军联合进行的，分作三个步骤：第一步，以在河州（今临夏市）以“西渡佯动”配合东北军取得甘肃西部——可以简要概括为“替东北军盘下河西走廊”；第二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这里的“甘北”是指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原、固原地区，准备攻宁；第三步，乘结冰期（12月）渡过黄河，夺取宁夏。[参见图1-1：“打通国际”的第一个蓝图——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首长决心图（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

再简而概而言之，红军主力在实现会师图谋宁夏之前，得先为他人作一回嫁衣——红四方面军以西进佯动，帮助东北军取得甘肃西部，“接通苏联”。

可能是张学良有张学良的难处——至少人家还没有与蒋介石公开翻脸，哪些便宜能占哪些便宜不能占不好占，他肯定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番盘算。同样，共产国际虽然已经得悉并肯定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开展的统战工作，并指出“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利用这种接触来开展我们对张学良军队的工作，巩固我们在他的各个部队中的阵地，并在士兵群众和军官中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但却仍然对张学良个人抱有或许可以理解的成见和怀疑：“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阀集团）失败之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⁴⁶……

或许是这两个因素之一，或许是这两个因素兼而有之，10天后的中共中央手中的“宁夏战役”蓝图，就大变了一个模样：东北军的参股没有了，战役第一步那个“为他人作嫁衣”，变成了“为自己作嫁衣”，而且不是佯动是真动——在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直接渡河西进，夺取青海和甘肃西部！8月22日，毛泽东拿出“打通国际”第一个升级版本与彭德怀磋商——

……

2. 黄河结冰期究有三个月还是二个月。

3. 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用少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4.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箝制毛、王、何敌，**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乎事实否。⁴⁷

次日，在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的征询电中，这个意思就被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

(一) 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

(二) 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到皮筏否。

(三) 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⁴⁸

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张国焘打电话就“**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方案向其征询意见时，他的回复是：“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肃西部！”⁴⁹

应该说，“**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方案，是很对张国焘的心思和胃口的，也很对红四方面军诸多领导成员的心思和胃口的。而就是在基层干部战士中，如果能解除“再翻雪山再过草地”的顾虑和担忧——比如建立比较巩固的甘南根据地作为补给后方，也是能够产生积极呼应的。

这又是为何呢？

六、凑足了本钱再说话——张国焘响应毛泽东的缘由

笔者认为，张国焘对这个中央“分攻宁、青”计划响应积极的原因有三——

其一，要在当年12月执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甘南地区建立相对巩固的根据地以为后方，这对刚走出草地来到这片相对安定和富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舔伤裹创休养生息之所在。

张国焘就曾在《我的回忆》中留下过这样的回忆文字：

8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里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大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右路军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⁵⁰

这不就是毛泽东浪漫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之张氏散文版么？

张国焘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话，他也应该有“悔不当初”之愧叹：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向东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行事，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在这方天